

## 译者行为研究专题导言

本专题由四篇文章构成,分别是周领顺所作的《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黄勤和何霜所作的《方志彤英译〈资治通鉴〉之译者行为探析》、李正栓和吴朝凤所作的《乐府诗〈十五从军征〉三位一体译者行为研究》,以及刘深强和刘珍珍所作的《〈西游记〉重译者行为模式解读》。这四篇文章构成了两条线,第一条是理论线,即周领顺对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的讨论以及刘深强等学者对《西游记》重译者行为模式的讨论。刘深强等学者的文章既有理论讨论,也有实践验证。他们通过案例,在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范畴内建构了重译评价模式,这不仅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建设的一部分,而且是对于重译或复译热点话题的延续。第二条是实践线,即黄勤等学者对于方志彤英译《资治通鉴》和李正栓等学者对于乐府诗《十五从军征》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实践线验证了译者行为的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的分析方法。文章以充足的资料,佐证了该三位一体分析系统的可行性。三位一体分析系统是通过方法引入的,可常用常新,在充分事实的支撑下,通过不断细化研究的角度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而使研究走向深入,从而得出理性的和符合实际的发现。

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在周领顺《译者行为评价系统的学理性》和《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外”研究——兼作翻译内外分析框架与“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的比较》两篇文章的理论讨论以及周领顺《译者行为互动关系分析》、专著《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4)以及学者们的实践验证下不断走向完善。关于三位一体分析系统,同一时期发表的应用成果还有周领顺的《学术跨界促进理论创新》、李正栓等人的《袁水拍汉译彭斯诗歌译者行为研究》和黄勤等人的《译者行为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下的译者行为比较研究》、闫怡恂的《译者行为批评模式的发展轨迹及其解释力》、姜淑芹的《儿童文学经典复译现象的译者行为研究》和李正栓等人的《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三位一体译者行为研究》,研究者可参考阅读。理论引导挖掘事实,也需要接受事实的不断检验。

——周领顺

# 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

周领顺

(扬州大学 翻译行为研究中心,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理路证明,三位一体系统呈现的是互动关系,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皆有充分的体现。三位一体系统既是可持续的理论发展系统,也是可用于框定论文的分析框架,还是在开展翻译批评时可用的评价模式,游刃有余,伸缩自如。它有助于完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提高译者行为研究的有效性,并提高翻译批评的操作性。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翻译批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2-0105-09

## 0 三位一体系统发展概述

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在新的发展时期的一部分,“具备了宏观上的理论发展系统和‘批评研究’的评价系统,中观上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以及微观上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模式三个功能”(周领顺,2024a:95)。三位一体系统属于理论层面上译者行为批评应有的内容,也是实践层面上开展译者行为研究而针对事实时所赖以使用的具体工具(理论框架、分析框架、分析方法、评价模式),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意义和研究上(包括评价上)的实践意义。

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除了宏观上的理论发展系统和评价系统外,中观上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以及微观上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模式,都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译者行为事实相结合而在研究上的应用,在具体运用时则无需细分。所谓宏观、中观和微观之说,只是理论者出于细化的必要而对自己认识的层次化。而周领顺(2023:19-20)所提倡的“研究者可着力开展‘评价系统’之‘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层次化分析框架的建设和应用,同时兼顾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说的即是宏观上的理论讨论和微观上的应用研究。即是说,本文所说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框架以及分析模式和评价模式虽然各自有其适用的

收稿日期:2024-1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译者行为研究”(21FYYB04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领顺,男,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译者行为理论与译者行为研究。

引用格式:周领顺.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J].外国语文,2025(2):105-113.

范围,但它们与常用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和翻译内外的分析路径一样,皆限于具体的分析之用。鉴于三位一体系统总体属于评价上的,常作为“批评研究”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所以也常称作评价系统,本文为便于阅读,故多以泛称的“系统”相称。

三位一体系统自建构以来,已经获得了相当一批研究者的回应,不仅有理论上的反思,也有具体的运用和验证。进行理论反思的如周领顺(2024d/e),马冬梅(2024)和闫怡恂(2025),而进行应用研究的要多一些,仅在第四届译者行为研究论坛(山东日照,2024年6月22~23日)上提交的论文就有黄勤所作的《译者行为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下的译者行为比较研究——以〈射雕英雄传〉英译系列为例》、陈龙宇所作的《“三位一体”分析框架的操作性——基于麦家谍战小说〈解密〉的译者行为研究》和唐红英所作的《华人获得语作家裘小龙中诗英译行为三位一体互动关系分析》等(许钧等,2025:6)。

准确地讲,本文是在周领顺(2024a)、周领顺(2024b)和周领顺(2024c)三文系统性讨论的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的梳理。周领顺(2024a)重在分析“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与3+1维度分析框架的学理性,周领顺(2024b)结合具体的分析案例,在实践上给予了充分的验证,而周领顺(2024c)则对比分析了译者行为批评翻译内外分析框架与“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的差异和交叉。

建构理论的过程,也是不断实践和完善的过程。要坚持译者行为批评与译者行为研究相互印证,从理论到事实,再从事实到理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才能够使理论不断与时俱进,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 1 三位一体系统的发展理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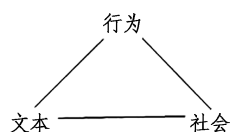
“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萌芽于行为观最初提出时(周领顺,2015:124),包容在“译者行为批评是以译者并具体以译者行为为切入口,以社会视域为评价视域,旨在评价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双边关系的描写性、批评性和框架性翻译理论”的表述中。“文本”是“文本—语言视域”,“行为”是“行为—文本视域”,而“社会”是“行为—社会视域”的简缩形式。

简繁表达的语体色彩是不同的,全称表达有视域内进行理论建设和拓展之意,简缩表达可以作为简单的分析框架和具体的评价模式使用,类似全称的“科学研究”和简称的“科研”在语体色彩上不完全相同一样。简称和全称各有其适用的范围。

行为观的意义旨在翻译内外以及文本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所以周领顺(2015:123)将“翻译内”称为“文本批评视域”,将“翻译外”称为“文化批评视域”,而将“行为批评视域”称为“翻译内外”视域。而如今为了更好地实现翻译批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总目标,有必要在“行为”的统领下将“文本”和“社会”这一链条上的两个端点担起来,形成“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

“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中含有“文本”“行为”“社会”三元素,但三者并不是

完全平行的关系,在这一链条上,“行为”是中心,立体地呈现为“行为”居上,“文本”和“社会”构成两个基点(见图):



“译者”和“行为”紧密相连,共同表述为完整的“译者行为”,但为什么用简缩的“行为”为核心而非简缩的“译者”呢?

“行为”是译者行为,也是以译者为代表的意志体的行为。在“行为—文本视域”看问题时,一般容易忽略或者难以解释社会视域的现象。以译者行为看问题时,有时又容易忽略或者难以解释传播等范畴的问题。所以,周领顺(2024a:113)将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的社会表述为7种关系,即:(1)帮助作者/原文“行远”的社会(涉及思想、意义和传播,从源点看目的地);(2)接受作者/原文的社会(从目的地看源点);(3)文本影响和作用的社会(翻译影响);(4)文本进入商业流通环节的社会(有译者译入、译出的取舍和有关方的利益纠葛);(5)从社会视角评价翻译现象的社会(评价视域和路径);(6)服务和对接的社会(翻译服务);(7)把翻译活动看作社会活动的社会(认识基点)。进入“行为—社会视域”看问题时,看到的是译者的社会性和翻译的社会化,涉及译者及其代表的意志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意义上的译者是基于原文的意义而进行的身位定位。而以“文本”代替常见的“译文”表述,也是因为译者角色化后会导致“译文”之译(对于原文意义的再现程度)的含金量变小,甚至完全改变原文的意义而变作“非译”。鉴于行为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因为无论谁是真正的意志体,其核心都是通过“行为”体现的,故作此选择性的表述。而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9:19)以Agent代指,行动者网络理论以Actor代指,即都是以行为者主体出现的,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不能反映译者行为研究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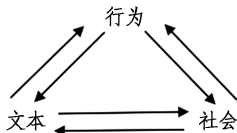
“行为”体现为动态并且表现动态,既是译者或以译者为代表的意志体在翻译过程中执行的行为,也是研究者开展动态译者行为研究的基础和评价者进行译者行为评价的着力点。在译者行为批评这一理论表述中,“译者”是执行者,“批评”是目标,而“行为”是实践中的译者及其代表的意志体,也是研究时的研究者和评价时的评价者其灵魂的根基所在。

行为是核心,内外因素最终作用于行为上。在“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分析框架之前常用的分析框架是“翻译内”(译内)和“翻译外”(译外)的分野(即翻译内外分析框架),但翻译内外分析框架精细度不够,甚至会有所忽略,毕竟只是以“翻译”为基点,或者说是以原文的意义为基点的,比如静态讨论译者而进行所谓的译者研究或者仅限于社会接受效果方面的讨论。以行为统领时,凸显了它的核心作用,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周领顺(2024c)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行为基于一种理念,理念源自认知经验与理性反思,又是行为的前阶,并为行为赋能。理念是对事物认知经验的高度概括和心理升华,是具有理性

高度的思想和观念。译者的行为理念与他的道德内涵和专业素养密切相关,译者行为批评已成为对译者行为进行研究的有力工具。”(刘满芸,2023:158)

## 2 三位一体系统的互动关系

在“行为”“文本”“社会”构成的三角互动关系中,“行为”处于翻译活动中枢的位置,主要通过译者来体现,而在行为的表现中,译者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角色化(见图)。



核心是“行为”,既和“文本”互动,也和“社会”互动,而它本身还有一个具体的翻译过程、心理过程和贯彻意志的行为力度等问题。每个因素又可以细分,比如文本可分为原文文本、译文文本和译者影响的文本(涉及对于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的操纵),行为可分为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求真”兼“务实”)、社会性改变行为(“务实”兼“求真”)和社会化反拨行为(“务实”兼“超务实”)(周领顺等,2024:18),或者分为译者的行为、以译者为代表的意志体的社会性行为和被社会影响的社会化行为,而社会分为读者、市场和特定的社会等,它们之间均呈现为互动的关系。

文本、行为和社会之间彼此互动,比如文本浓缩自“文本—语言视域”,但传统的翻译研究就一直在该视域做文章的,伴以思维、方法和研究,但在译者行为研究中,该视域与行为(“行为—文本视域”)和社会(“行为—社会视域”)呈现为互动的关系,它是整个系统中不可忽略的一环,三个视域互相衔接,彼此互为关系,正如“求真”和“务实”的关系一样,提及“求真”,就必然涉及或想到“务实”,而提到“务实”,也必然会涉及或想到“求真”。在翻译实践上,“忠实”是单维的,缺乏制约的条件。

互动是译者行为研究的灵魂,这是单维的“忠实”所无法企及的。“忠实”只能是实践者的行动指南,至于结果是否如译者所愿,并不会取决于译者的一厢情愿。更深层次地看,中国译者是读者,也是消费者,在外译汉时坚持忠实的原则,也满足了译者本人作为读者和消费者内心潜藏着的需求欲望,这也是翻译目标所在,但在汉译外时,情况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如曹顺庆、刘诗诗(2024:33)所说:

本土文学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的忠实度并非衡量其成效的唯一标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尊重文明异质性产生的适度变异反而能有效地拓展其国际传播的覆盖范围与影响力深度。

此时,中国译者本人已经不是读者和消费者,角色随需求的有无或者多少而发生变化,甚至更准确地说是随翻译目标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甚至研究者(包括具体的评价者)在面对复杂的翻译活动时产生评价双轨制的心理变

化也是值得研究的,这是一个悄然变化的心理过程,尽管研究者表面上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颇像每个人的心中都寄居着另一个自己(the other self)一样。关于译者的心理变化因素,周领顺(2024c)多有涉猎,研究者可结合阅读。

关于“忠实”,中国译者在面对英译汉时所坚持的“忠实”和面对汉译英时所坚持的“忠实”并不完全相同,对于前者,是要尽可能全面求真于原文的,而对于后者,是要尽可能全面务实于异域读者的,造成评价双轨制的出现,皆源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正是这样的复杂性在不知不觉间导致译者和研究者不得不扩大“忠实”的内涵,只有扩容才能增强其解释力,显然是在人为地为自己翻译行为和研究行为的合理性去寻找存在的依据。其中,除了翻译活动复杂性的一面外,还有原文“意义”<sup>①</sup>纷繁的原因,所以常令研究者在以“忠实”为标准解释现象时捉襟见肘,也在捉襟见肘时不断“打补丁”扩充概念的内涵。换句话说,本应该是严谨的学术术语,却失去了学术术语应有的严谨性,不禁令人唏嘘。

文本是追踪译者行为痕迹的物质基础,但“文本—语言视域”静态呈现语言文本意义之真,未必能表现于动态中的译者行为,所以它作为译者行为研究中三大视域中必有的一环,必然要过渡到“行为—文本视域”,而“行为—文本视域”所呈现的译者的社会性和译者的相应努力,未必能在社会效果上达到译者以及背后意志体的预期,所以要过渡到“行为—社会视域”加以验证,而在该视域接受的效果或验证的结果,特别是务实的效果,必然反作用于“文本—语言视域”的语言文本意义之真上,是否偏离或改动原文的意义,最终会在译者行为和行为的结果——译文上得到反映。从这点讲,“文本—语言视域”虽然是传统翻译研究的主阵地,但鉴于该视域与其他两个视域的互动并呈现微循环的关系,所以与传统翻译研究的路径又有本质的不同。

“三大视域之间是循环关系,可进一步凝练为‘文本批评’‘行为批评’和‘效果批评’等三个语义框架”(周领顺,2024a:111),三大视域凝练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3+1)分析框架,逻辑严谨,循环互动,完全能够成为学位论文理想的分析框架。文本、行为和社会皆可单独设章,“3+1”中的“1”指的是行为过程,也是翻译内外分析框架中的“翻译外”部分,鉴于它的核心是互动,所以有必要将“1”单列为一章,既要表现出三个视域的相互作用(通过互动而递进),也要表现出行为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互动,以反映复杂的翻译过程以及整体上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就此形成一个严谨的逻辑闭环,使整篇论文浑然一体。

在“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内,“翻译内”(译内)对应的是其中的“文本”范畴,“翻译外”(译外)对应的是其中的“社会”范畴。但严格地讲,又不尽然,因为“内”和“外”是以“翻译”作为讲话的核心的,正如语言表达上的“党内”和“党外”是以“党”为讲话的

<sup>①</sup> 除了常说的形式意义、概念意义、词汇意义、结构意义、文化联想意义等等意义之外,直接就翻译而论,还有文本表面上的意义、作者真实的意义和经过译者影响的意义等。

核心、“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是以“文学”为讲话的核心、“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是以“虚构”为讲话的核心一样。如果将“翻译外”(译外)表述为“社会”,无疑将放大社会背景、社会的作用以及与社会相关的一切因素,比如以社会为背景看问题或者关注来自社会的因素如出版社的声誉、市场定价、广告投入和宣传力度、针对的人群和人群的反应以及社会对于译者行为产生的作用力。“社会”在“行为—文本视域”是被提及的“‘外城’社会中心”(周领顺,2014:227)<sup>①</sup>,但不是研究的焦点,不同于专门从社会视域(“行为—社会视域”)对问题的审视。

传统上的互动关系研究基本上是“译者与作者、读者互动研究”(王亚、文军,2023:126),或者表述为“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彭白羽,2023:6),而目前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研究,是将传统上的“作者”一端扩大为“文本”,将“读者”一端扩大为“社会”,这不仅仅是称谓上的变化,更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视野的扩大,会在描写翻译过程和整个翻译活动的过程中不断靠近翻译批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总目标。

### 3 三位一体系统宏观综评和微观验证

宏观上的三位一体系统,既是理论的发展系统,也是译者行为批评所规定的评价系统,总体来讲,都呈现为宏观上的一体化发展路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程维曾对译者行为批评作出高度评价:

自1992年许钧先生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翻译批评研究专著《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起,我国翻译批评研究开始了系统化和科学化的探索之路,周领顺教授所原创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就是其中理论自觉的优秀代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体系日臻成熟,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深耕译者行为研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成果。而今,译者行为研究向纵深发展,社会维度被纳入其理论框架,构建了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其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正从学理性、创新性和科学性等维度接受学界的全方位检验和评价,同时在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深化和发展。(许钧等,2025:4)

这里的三位一体系统,便指的是宏观上的理论发展路线。将三位一体看作宏观上发展路线的还有许钧(2023)。周领顺(2022)所说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将在构建“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的基础上形成“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也是此意。

“译者行为批评立足于主体间、文本间、文化间的关系,以‘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为基础,并发展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结合文本性和人本性的双重视域,实现了翻译内外因素的协调和对话,延展了描写语境下翻译行为的概念边界,形成了更加

<sup>①</sup> 周领顺(2014:227)在展示“‘紫禁城’原文中心”和“‘外城’社会中心”的“城池图”上误将“‘外城’社会中心”标记为“‘外城’原文中心”。

全面客观的翻译批评体系”(彭白羽,2023:117),这是从三位一体在宏观发展系统中的位置进行讨论的。

马冬梅(2024:64)总结周领顺译者行为研究思想的系统性发展中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便是“持续加强理论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构建了‘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实现对译者行为的全过程评价”。“全过程评价”既是宏观上的理论发展系统,也是微观上如何进行全面评价的应用、操作问题。

之所以将三位一体看作“全过程评价”系统而需要对翻译活动进行全面评价,原因正如袁丽梅(周领顺等,2024:81-82)所认为的,翻译活动是错综复杂的,既涉及文本层面的语言文字转换,也无法摆脱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提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可以全面反映我们对于翻译活动各方面、各环节、各层次的认识,可以有力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通过译者这个关键因素实现翻译内外研究的起承转合,显示出理论创始人精准的学术洞察力,应了方梦之(2021:32)所说的“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而且是意志体,是造就翻译活动复杂性的原因之把译者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有望破除译学研究和翻译批评实践主观性的‘顽疾’”。

周领顺等(2023:11)通过微观上的研究证明该三位一体评价模式的有效性,并认为:

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模式是译者行为研究评价系统的主要代表模式,它立足行为,瞄准评价,重视框架构建,服务译者行为解释与分析,构成了译者行为研究理论系统—应用系统—评价系统中重要的一个子系统。

在微观上,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分析框架是由“3+1”的维度构成的。就三位一体系统作为分析框架的有效性,闫怡恂在经过验证后写道:

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模式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框架与解释路径,在原来传统的文本—语言视域批评模式基础上,增加了行为—文本视域与行为—社会视域。一方面,这使得翻译批评理论的话语内涵更加丰富,框架更具层次,路径更加清晰。另一方面,该评价模式也给翻译的社会性研究注入了一泉活水,促使翻译的社会性在研究关注译文、译者的“社会性”因素的同时,也不摒弃翻译赖以生存的“文本性”特征,更不忽视起到灵魂作用的“译者”行为,“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模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译者行为研究作为本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批评研究流派,为丰富中国翻译批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构建做出了贡献。(周领顺等,2023:11)

钟厚涛(2024:24)也把译者行为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使用:

鉴于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此问题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本文尝试借鉴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对上述追问进行探析后得出结论:德国诗人许纳在《沧浪诗话》的英译过程中,形成了以译者为中心的回环型跨文化与跨时空生成结构。

单宇、廖锐(2024:85)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是:

依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清末民初科技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国家意识的表征,可进一步划分为翻译内部表征和翻译外部表征,完整形成了“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

之所以称为分析框架或用作分析框架,就是能够对整个研究起到框定、约束的作用。李正栓(2024:32)曾评价:

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代表之一,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翻译领域内的重要实践,目前已成为国内译界前沿理论,使用者众多,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模式、“求真—务实”评价连续统、“翻译内—翻译外”的描写视域,为研究译者行为及翻译活动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工具。目前,译者行为研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

这里说的是微观上的三位一体,因为作者是将“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作为评价模式看待的,而评价模式是工具,与“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和“翻译内—翻译外”分析方法并行用于解决问题、解释现象并指导实践上。

“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作为与事实相结合的分析工具,与常用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和翻译内外的分析方法都具备了工具性。马冬梅(2024:70)除了将其看作宏观上的评价系统外,也看作微观上的研究手段(工具),即她所说的译者行为研究的“研究手段在初期主要体现为‘求真—务实’连续统和‘求真’‘务实’‘合理’三度一体分析框架,在新阶段主要体现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模式”。

宏观的理论引领与微观上的应用可以各自独立,但也互不可分。刘锦晖、彭鲁迁(2024:33)认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科学地评价译者行为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概念和研究路径。该理论将译者行为研究置于“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中,将“翻译内”与“翻译外”、人本与文本等多维度视域纳入批评研究,进行多维结合研究,足以实现翻译批评的终极目标。

#### 4 结语

本文讨论了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理路,展示了三位一体系统的互动互联,以及研究者对于三位一体系统从宏观角度所作的综合评价和微观角度对于它的验证,以期完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并提高译者行为研究的有效性。

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批评的一部分,而译者行为批评又指导着译者行为研究。要提高译者行为批评对于译者行为研究的指导力和翻译批评实践的操作性,就要不断在实践中完善理论,而打磨具体的理论工具便是必要的第一步,“磨刀不误砍柴工”,理论工具便于使用,那么研究就会得心应手,这是一条务实的研究路线。总体而言,译者行为批评和译者行为研究是在不断解决现实问题和不断完善理论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

## 参考文献:

- Chesterman, A. 2009.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or Studies [J]. *HERME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42):13-22.
- 曹顺庆,刘诗诗. 2024. 翻译变异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J]. *江海学刊*(4):22-33.
- 单宇,廖锐. 2024. 清末民初科技翻译活动中的译者国家意识及当代启示[J]. *上海翻译*(5):83-89.
- 方梦之. 2021. 我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勃兴之路[J]. *当代外语研究*(1):29-37.
- 李正栓. 2024. 典籍翻译研究专栏[J]. *燕山大学学报*(5):32.
- 刘锦晖,彭鲁迁. 2024. 求真与务实并举:美国汉学家艾思柯英译李清照诗词译者行为研究[J]. *燕山大学学报*(5):32-39.
- 刘满芸. 2023. 共生翻译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马冬梅. 2024. 周领顺译者行为研究思想的系统性发展[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6):64-86.
- 彭白羽. 2023. 译者行为批评的修辞诗学路径探析——以张之洞《劝学篇》英译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2):116-124.
- 王亚,文军. 2023. 国内译者研究30年:现状与展望[J]. *外国语文*(4):121-130.
- 许钧,周领顺. 2025. 推动译者行为研究向纵深发展[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1-9.
- 许钧. 2023. 理论创新的起点与重点——在第三届全国“译者行为研究”论坛上的讲话[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4):4-5.
- 闫怡恂. 2025. 译者行为批评模式的发展轨迹及其解释力[J]. *山东外语教学*(2):108-121.
- 钟厚涛. 2024. 译者显身与跨文化生成——论德国诗人对中国《沧浪诗话》的英语翻译[J]. *当代比较文学*(2):22-38.
- 周领顺,黄鹂鸣,陈龙宇. 202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称谓问题——答研究者(之四)[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3):15-29.
- 周领顺,李正栓,黄勤,姜淑芹,袁丽梅,李鹏辉. 2024. 译者行为批评新思维对话[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79-87.
- 周领顺,田海龙,任东升,闫怡恂,王峰,赵国月,彭白羽,杨彬. 2023. 译者行为研究新发展对话[J]. *语言教育*(3):3-18.
- 周领顺. 2015. 翻译批评第三季——兼及我的译者行为批评思想[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122-128+161.
- 周领顺. 201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领顺. 2022. 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批评的关键路径[N]. *社会科学报*,2022-12-13(8).
- 周领顺. 2023.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一)[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4):6-23.
- 周领顺. 2024a. 译者行为评价系统的学理性[J]. *外语导刊*(1):106-114.
- 周领顺. 2024b. 译者行为互动关系分析[J]. *外语研究*(3):1-5.
- 周领顺. 2024c. 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外”研究——兼作翻译内外分析框架与“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的比较[J]. *中国外语*(5):106-112.
- 周领顺. 2024d. 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一体化路线图[J]. *外语教学*(5):77-83.
- 周领顺. 2024e. 译者行为研究的创新性[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59-67.

## The “Text-Behavior-Society” Trinity System in Translator Behavior Studies

ZHOU Lingsh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ationale of the “text-behavior-society” trinity system in translator behavior research demonstrate that the trinity system presents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hich is fully reflected at both the macro meso-level and micro levels. The trinity system is only a system for sustaine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can be deployed to delimit a thesis, and further, a mode of evaluation that can be utilized in conducting translation criticism. It is versatile and adaptable. It helps to refine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lator behavior research, and improve the operabilit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Key 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ranslator behavior studies; “Text-Behavior-Society” trinity; translation criticism

责任编辑:陈宁